

## 第一章 妇女在男人生命 周期中的位置

---

在《櫻桃园》的第二幕中 年轻的商人罗伯辛描述了自己辛勤劳作和成功的生活。他没有说服朗涅芙斯卡娅夫人砍伐櫻桃园，以便保护自己的庄园 在下一幕中 他自己将櫻桃园买了下来。他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在购买这座自己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当过奴隶的庄园时 试图抹去以往“ 难堪的、不幸福的生活 ” 他把櫻桃园变成了避暑别墅 在这里后代“ 将看到一种新的生活 ”。在表达这种发展观时 他透露了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成立的男人的意象：“ 有时 当我无法入睡时 我想 主啊 您赐予我们无边无迹的森林，广袤的大地和一望无迹的地平线，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我们实际上应当是巨人 ”。此时 朗涅芙斯卡娅夫人打断他说：“ 你们

感觉需要巨人，他们只是在寓言故事里是善良的，在别的地方只能对我们构成威胁。”

人类生命周期的概念试图把不断扩展的体验和知觉，把变化着的愿望和每一天的生活现实秩序化和内在逻辑化。但是，这些概念的实质部分地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契诃夫戏剧的主要片段说明，当观察者是妇女时，视角或许是不同的。男人作为巨人意象的不同判断意味着不同的人类发展观，想象人们处境的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价值观。

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过程中，人们在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同时，社会科学也重新发现了性别差异。当从前在科学的客观性方面被认作性别中立的理论如今被认识到始终反映着一种观察和评价偏见的时候，这个发现就开始了。于是，人们想象的科学中立，如同想象的语言本身的中立一样，让步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范畴是人类建构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如何习惯于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待生活时，对已经宣告为 20 世纪神话观的热衷，以及相应地对判断相对性的承认也注入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一个新近地发现涉及到显然是无辜的 W. 斯特伦克 (William Strunk 和 E.B. 怀特 E.B. White 的名著《文体概论》(The Elements of Styles)。最高法院对性别歧视议题的裁定使一位英语教师注意到，人们通过把拿破仑的出生、柯尔律治的作品以及下述陈述对应起来作为范例来教授英语用法的基本规则，诸如把“他是一个有趣的，健谈的人。一个周游过整个世界，在六个国家生活过的人”一类的陈述同“喂 苏珊 你陷入真正的麻烦，或者不那么激烈地说，他看到一位妇女 领着两个孩子，顺着这条路慢慢地走下去”的陈述对应起来。

心理学家像斯特伦克和怀特一样无辜地陷于同样的观察偏

见。在含蓄地采纳男性生活作为标准的过程中，他们一直试图以男人的布料来装扮妇女。当然，这全都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这个故事此外还表明，如果你以一个男人来创造妇女，就注定要陷入麻烦。在生命周期中，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妇女一直是偏离的。

发展理论家设计男人意象的偏好——这显然是令妇女恐慌的偏好，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1905）他围绕着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的体验建立起性别心理发展的理论。在本世纪 20 年代，他着力解决由于妇女生理解剖方面的差异，以及少女早期家庭关系的不同结构给自己理论带来的矛盾。他在尝试了把妇女框入自己的男性概念，看到妇女嫉妒她们所失去的东西之后，开始意识到妇女在前恋母情结时期对母亲依恋的强度和持久性，以及她们发展上的不同。妇女在发展上的这种不同导致在他看来发展失败。

在把超我或者良心的形成同阉割焦虑联系起来后，弗洛伊德认为，妇女生来就被剥夺了果断地解除恋母情结的冲动。因此 妇女的超我——恋母情结的后继者——也作出让步 它绝不是“那么不屈不挠的，那么超出个人的，那么像我们在男性那里要求的那样摆脱了它的情感起源”。从对差异，即“对妇女来说伦理上正常的标准不同于男人”这一点的考察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妇女“表现得不如男人那么具有公正感，对承受生活中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差些，她们的判断更为通常地受到喜恶感的影响”（1925:257-258）。

因此 理论上的问题变成了妇女发展上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体现在她们对关系的体验中。N. 乔多罗（Nancy Chodorow, 1974）在试图说明“每一代人体现出男女人格以及角色特点的

某种一般的、几乎是普遍差异的再生产”过程中，没有把两性间的这些差异归于解剖学，而是归于“妇女普遍地要对照顾幼小孩子负有重大责任的事实”。由于这种早期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男女儿童体验的不同，在人格发展中，基本的性别差异会再度重现。因此，“在特定的社会里 同男性相比 妇女的人格更多地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中开始确定的”（43-44）。

在分析中，乔多罗主要依赖于 R. 斯托勒 (Robert Stoller) 的研究 后者表明 性别的认同 人格形成的不可改变的本质 除了罕见的例外，对男女儿童来说都是在三岁左右稳定的、不可改变地确立起来的”。假定在三岁之前男女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是妇女，性别认同形成的人际关系动力对男女儿童来说便是不同的。女孩的认同形成于不断发展的关系背景之下，因为“母亲试图更像她们自己，以及延续自我那样地体验自己的女儿”。相应地，女孩在把自己认同为妇女的过程中也像母亲那样体验自我，由此便把这种依恋的体验与认同形成的过程融合在一起。相反，“母亲把儿子作为异性来体验”，而且男孩在把自己确定为男性的过程中，把自己同母亲分开，由此便削弱了“他们最初的爱以及移情联系的感觉”。结果，男性的发展包括了一种“更为突出的个性化，以及对所体验到的自我边界更具防御性的规定”。对于男孩来说，“区分问题已经同性别问题交织在一起了”（1978: 150、166-167）而女孩却并非如此。

在对心理分析理论中的男性偏见作出反驳时，乔多罗争辩说，在个性化以及关系的早期体验方面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有一个‘更弱’的自我边界，或者更倾向于精神上的极度焦虑”。相反，它意味着“女孩从这个时期起奠定了‘移情’的基础，它使女孩以不同于男孩的方式作出最初的自

我定义。”因此，乔多罗以自己积极而直接的说明取代了弗洛伊德对妇女心理消极的和演绎性的描述：“女孩具有更坚定的基础，像体验自身一样地去体验他人的需要或情感（或者设想一个人是如此体验他人需要和情感的）。此外，女孩并没有以男孩那样的程度通过否定前恋母情结关系的方式来定义自我。因此，对这些方式的让步也没有让她们感到对自我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因而，从很早的时候起，由于她们与相同性别的父母打交道……，女孩并不像男孩那样有区别地体验自我，她们更连续性地与外部对象世界保持关系，而且也从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内在对象世界”(167)。

因此，男女对于关系，尤其是依赖性问题的体验是不同的。对于男孩和男人来说，分离和个性化与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因为与母亲分离对于男性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女孩和妇女来说，女性表现或者女性认同并不取决于与母亲分离，或者个性化的过程。既然男性是通过分离，而女性是通过依恋来规定的，男性的性别认同便受到亲密关系的威胁，而女性的性别认同则受到分离的威胁。因此，男性倾向于在关系方面遇到困难，而女性倾向于在个性化方面出问题。然而，与男性相比，形成女性生活特征的，体现在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特性，不仅构成描述上的不同，而且在心理学文献把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里程碑看作以不断分离为标志时，也成为发展上的不足。因此，依照定义，妇女在分离上的失败也意味着发展上的失败。

在对儿童游戏的研究中，乔多罗描述的童年早期人格形成上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童年中期。G.H.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934) 和皮亚杰 (1932) 都把儿童的游戏看成学校期间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会去扮演他人的角色，

逐渐地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自己。在游戏中，他们也学会了尊重规则，并逐渐地理解了规则建立和变化的途径。

J 利弗 (Janet Lever, 1976) 认为，在小学期间同龄人是社会化的力量，游戏在这一阶段是社会化的重要活动，她着手去发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对 181 个年龄为 10 岁和 11 岁就读五年级的白人中产阶级子女的研究中，她观察到儿童游戏时的组织结构。她对孩子在课间以及体育课上的游戏进行观察，此外还每天把孩子们讲的自己如何利用校外的时间记录下来。从这一研究中，利弗报告了性别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在户外活动；男孩更经常以不同年龄组成的大帮进行游戏；他们更经常玩竞争性的游戏，他们的游戏时间比女孩长。从一些方面来看，后者是最有意思的发现。男孩的游戏看起来持续的时间长些不仅是因为它们需要更高的技巧水平，因而不大可能令人厌烦，而且因为如果在游戏过程中出现分歧，男孩能够比女孩更有效地解决争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男孩子一直在争吵，但没有一次游戏是由于争吵而结束，它被打断也不超过七分钟。在最激烈的争辩中，最后一句话总是‘重玩’，随后一般便会有对‘欺骗者证明’的众口一词”(482)。事实上，男孩像享受他们游戏那样地享受合法的争辩，即使是不那么有块头和技巧的随帮唱影者同样也会参加这些经常发生的争吵。相反，女孩之间出现的分歧会导致游戏的结束。

因此，利弗扩展和证实了皮亚杰在研究游戏规则时的观察，皮亚杰发现，在整个儿童时期男孩变得越发地执迷于对规则进行合法的解释，以及裁决冲突时的程序公平，他指出，女孩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执迷。皮亚杰观察到，女孩对待规则有更“实际”的态度，“只要游戏能够补偿这一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好的”

(83)。女孩对待规则的态度也更为宽容，更愿意破例，更容易接受创新。因此，被皮亚杰视为道德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意识“在女孩身上的体现远非不如男孩”(77)。

皮亚杰把男孩发展等同儿童发展的偏见也影响了利弗的著作，构成她讨论结论的设想是，男性模式是更好的模式，因为它满足了现代社会成功的需要。相反，女孩通过游戏发展起来的对他人情感的敏感和关切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甚至能对事业成功构成障碍。利弗暗示说，在成年人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女孩日后不想依靠男人，她在童年就必须学会像男孩那样地游戏。

对于皮亚杰的论点——儿童通过玩由规则规定的游戏而学会尊重规则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L.柯尔伯格(1969)补充说，人们通过在解决争端过程中出现的承担角色的机会卓有成效地学习到这些课程。因此，女孩游戏中所包括的道德课程似乎少于男孩的游戏。传统的女孩游戏，像跳绳和跳房子是轮流着玩的，这种游戏的竞争是间接性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未必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因而，需要裁决的争端也不大可能出现。事实上，利弗访谈的大多数女孩都声称，当出现争吵时，她们就会结束游戏。女孩宁愿保持关系而结束游戏，也不愿意精心制定一个解决争端的规则制度。

利弗得出结论说，男孩在游戏中学会了独立和组织技巧，这是为协调大型的，以及各种人参与的活动所必备的。通过参与有控制的和社会认可的竞争，他们学会以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来对付竞争，即与自己的敌人一起玩耍，同自己的朋友竞争——这些全都吻合游戏的规则。相比之下，女孩喜欢与较少的、较亲密的人一起玩，通常是与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是在幽僻的地方。这种游戏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模式，因为它的组织更具有合作

精神。因此 用米德的话说 它不那么倾向于去学习承担‘普遍化的他人’的角色 也不那么倾向于把人们关系抽象化。但是 它加强了对移情和敏感的培养 这也是为承担‘特殊化的他人’角色所必需的，而且更倾向于把他人看作是自我不同的。

因此，乔多罗从分析母亲与子女关系得出的儿童早期人格形成上的性别差异，通过利弗观察到的儿童中期游戏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得以扩展。这些说明都提出了男女儿童是以不同的人际关系方向，不同范围的社会体验进入青春期的。然而，既然青春期被当做分离的关键时期“第二个个性化过程”的时期（Blos, 1967），那么它也是妇女发展出现巨大偏差，因而是最有疑问的时期。

弗洛伊德认为，“使男孩带来性欲大量增长的青春期，在女孩那里是以压抑的新波动为标志的，”这是为年轻姑娘的“男性性别”转化为她成年期特有的女性性别所必需的（1905:220 - 221）。弗洛伊德把这种转变设想为女孩对“自己阉割事实”的承认和接受（1931:229）。他解释说，青春期带给女孩一种新的意识——“对自恋的伤害”，导致她发展起“如同疤痕一样的劣势感，”（1925:253）。因此，在 E. 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说明的扩展中，青春期是随着认同而发展的时期，女孩或者是通过心理危机，或者是以不同的议程抵达这个关口。

在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显然出现了人类发展理论家提出的女性青春期问题。他勾画出社会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1950），青春期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形成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并且证实一种能够跨过青春期的非连续性，使成年人的爱和工作能力成为可能的认同。在埃里克森对前四阶段特定危机的描述中，对如何准备成功解决青春期的认同危机问题也进行了描述。尽管新生儿期“信任感对不信任感”的最初危机把发展固

定在关系体验方面，但当时的任务显然是个体化。埃里克森的第二阶段集中在“自主性对羞愧和疑虑”的危机，这标志着学步的儿童有了分离和行为意识。接下来发展通过“主动性对内疚”的危机得以继续，危机的成功解决表明在自主性方面的进步。继而，随着恋母情结时期神秘愿望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儿童意识到为了与父母竞争，自己必须首先听从父母并且学习把他们做的事情做得同样好。因此，在儿童中期，发展转变为“勤奋对自卑”的危机，能力的证明对于儿童自尊心的培养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儿童努力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以便被自我和他人承认具有成人能力的时期。下一阶段便是青春期，通过认同的发展，自主的、主动的、勤奋的自我的庆典建立在一种思想意识之上，这种意识能够支持和证明成年人的赞美是正确的。然而，埃里克森谈论的是什么人呢？

它再一次证明是男孩。埃里克森认为（1968）对于女性来说结果有些不同。她暂时搁置自己的认同，因为她准备去吸引男人，依据这个男人的名字她将被认识，依据这个男人的地位她将被定义。这个男人通过填补她“内在的空间”把她从空虚和孤独中拯救出来。对于男性来说，认同先于在人们分离和依恋的理想循环中的亲密关系和生殖力，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些任务似乎被融合在一起了。亲密关系伴随着认同而发展，因为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被认识的。

然而，尽管埃里克森观察到了性别差异，他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仍保持不变：认同还是先于亲密关系，因为男性的认同继续规定他生命周期的概念。但是，在男性的生命周期中，对成年初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准备。最初的信任感对不信任感阶段只是强调互动关系的类型，这在埃里克森看来意味着亲密关系

和生殖力、而在弗洛伊德那里指的是性功能。余下的便是分离，便是发展本身开始等同于分离，依恋则似乎成为发展的障碍，就像在评价女性时不断出现的情况一样。

埃里克森关于男性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形成认同，女性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唤醒认同的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曾出现在 B. 贝特尔海姆 Bruno Bettelheim, 1976 解释认同的神话故事中。在《三种语言》中，男性青春期的动力以父子之间的冲突得到形象的说明。父亲给他看来愚蠢之极的儿子最后一次机会——送他去向一位教师学习一年。但是，当儿子返回时，所学到的一切就是“狗的狂叫”。又做了两次这样的尝试之后，父亲在厌倦中放弃了，命令仆人把这个孩子带到森林里杀掉。但是，一直充当这个被抛弃孩子保护神的仆人们同情他，决定只是把他留在森林里。这个孩子从那里游荡到一片被疯狗包围的土地，狗的狂吠让任何人都无法安生，它们也定期吃掉一个周围的居民。现在看来我们的主人公刚好学到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他能够与狗交谈并让它们安静下来，因此，这块土地又恢复了和平。既然他获得的其他知识同样也能很好地为他服务，那么他在青春期与父亲——生命周期概念中的一个巨人——的冲突中，便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

相比之下，女性青春期的动力是通过迥然不同的故事来描述的。在神话故事里，姑娘第一次月经后出现了紧张的消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在《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的沉睡中，贝特尔海姆看到自认为是冒险活动必然陪衬的神情贯注。因为，从沉睡中醒来的年轻女主人公没有去征服世界，而是与王子结了婚，她们的认同内在地是由人际关系来规定的。贝特尔海姆和埃里克森的解释都认为，女性的认同与亲密关

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童话故事世界所描写的性别差异，如同 M. H. 金斯頓 (Maxine Hong Kingston) 近来的自传体小说 (1977) 中女斗士的想象一样，这本小说再现了古老的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以及坦克雷德与克洛里恩达的故事，它再一次说明刺激的冒险是男人的行为，如果一位妇女进行这种努力，她至少必须穿着像男人。

这些性别差异的说法支持了 D. 麦克莱兰 (David McClelland, 1975) 得出的结论：“性别角色成为人类行为中最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家在经验研究伊始便发现了性别差异。”但是既然不提‘好些’或者‘差些’就难以说清‘差异’既然有了建构唯一衡量尺度的倾向，既然这个尺度通常是来自男性对研究数据（主要地或完全地从研究男性中得来）的解释，并以此为根据而形成标准，心理学家便趋向于把男性行为视为‘标准的’行为，把女性行为看成是对这个标准的某种偏离” (81)。因此，当妇女不适合心理学期望的标准时，人们通常总是得出结论说，女性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M. 霍纳 (Matina Horner, 1972) 发现，妇女身上的问题是她们对竞争性成功表现出焦虑。应用主题统觉测验对人们行为动机进行研究，从一开始便受到性别差异征象的困扰，它们似乎使数据分析混乱和复杂化了。主题统觉测验给解释提供了一条含糊不清的线索——一幅关于将被写成的故事或者故事片断的图画。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故事在反映投射想象的过程中，揭示了人们对自己所领悟到的东西的解释方式，也就是他们给自己的体验，因而大体上是他们建构生活的意义提供概念和说明。在霍纳的著作之前，女性对于竞争性成就显然与男性有着不同的感觉，她们以某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状况，或者说这些状况

在她们那里唤起了不同的反应。

在对男性研究的基础上，麦克莱兰把成就动机概念分为似乎是以两个逻辑部分构成的东西——取得成就的动机（“希望成功”）以及避免失败的动机（“恐惧失败”），从自己对女性的研究中，霍纳确定了第三个范畴，即未必可能避免成功的动机（“恐惧成功”）。女性似乎在竞争性成就方面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来自一种感觉到的女性与成功之间的冲突，它是青春期中女性在努力把自己的女性期望、儿童早期的身份证明与在学校获得的、较具男性化的能力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这从她对女性成就故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后，安妮发现自己在医学院的班里名列前茅，”通过观察女性在竞争性成就状况下的表现，霍纳报告说，“当很可能或有可能取得成就时，女性预想到伴随成就而来的消极结果，由于这些消极结果的威胁，青年妇女变得焦虑起来，她们积极进取的努力遇到了挫折”（171）。她得出结论说，这种恐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由竞争取得成就的行为中，大多数女性对成功的预测，尤其是对与男性对抗的预测，产生了对一些消极结果的设想，例如被社会拒绝以及失去女性气质的威胁”（1968:125）。

然而，这种成就的冲突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G. 萨森（Georgia Sassen, 1980）指出，女性表现出来的这种冲突反之表明对由‘竞争取得成就’的‘另一方面’更为深刻的认识，即通过竞争获得成功所花费的巨大情感代价经常得到补偿——这种理解尽管是混乱的，但还是表明某种基本的含义，即在成功被定义为胜别人一筹的状态下，某种东西是很糟的”（15）。萨森指出，只有当成功通过直接竞争获得时，即当一个人的成功要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时，霍纳发现的成功焦虑才出现在妇女身上。

在解释认同的危机时，埃里克森 1968 引 G.B. 萧伯纳的生活说明一个年轻人在不能全身心赞同的事业上过早取得成就的感受。七十岁的萧伯纳在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描述了自己二十岁时不是由于缺乏成功或者得不到承认，而恰恰是由于这两者过多所带来的危机：“我取得了成就，尽管我感觉到内心的惊慌，事业不但没有把我当成一文不值的骗子来驱赶，反而把我死死地捆住，不容我脱身，因此，二十岁的我由于业务训练有素而被注视，我就像任何健全的人厌恶无法逃脱的什么东西一样从心底讨厌自己从事的职业，1876 年 3 月我逃脱出来”（143）。此时，萧伯纳平静下来随心所欲地写作。由于萧伯纳的拒绝很难解释为关于成就和竞争精神焦虑的依据，因此这对埃里克森意味着“（逐渐）向前发展的一种超常人格的不平凡的业绩”（144）。

我们现在可以基于这些理由提出问题，为什么女性不涉入竞争性成就的冲突？为什么男性表现得如此容易接受和庆贺一种相对狭隘的成功观。让我们记住利弗确证的皮亚杰的观察，男孩在游戏中更关心规则，而女孩则更操心关系，并且经常以牺牲游戏本身为代价；依据乔多罗的结论，男性的社会目标是地位，而女性则是人际关系，我们至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霍纳由竞争取得成功的故事里以及由男性完成的故事里当“安妮”变成“约翰”时，成功的恐惧便趋于消失。约翰被看成是通过规则来游戏的，并且取胜了。他有权利对自己的成功感觉良好。在与那些能力比自己差些的人们分离开来，并确立起认同感之后，他对自我的定位也确立起来，而对于安妮来说，事实上她在医学院班上名列前茅的地位可能并不是她所想往的。

V. 伍尔夫认为，“女性的价值观显然通常有别于男性一直

倡导的价值观”(1929:76)。然而,她又补充说:“社会流行的是男性价值观”。因此,女性愈发地对自己的情感标准提出疑问,并且在听从他人意见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判断。在 19 世纪的妇女小说中,伍尔夫看到“一种略微地偏离直线的观念,以及在服从外部权威中对这种明确观点的改变”。在 20 世纪妇女的判断中,人们也能看到对他人观点以及价值观一如既往的服从。妇女寻找或公开讲出自己体验的困难不断地以资格证明和自我怀疑的形式出现,而且也暗示着一个划分开来的判断——迥然不同的公共评价和私人评价。

然而,伍尔夫批评的妇女的服从和混乱出自她视为女性力量的价值观。妇女的服从不仅根源于她们在社会中的屈从地位,也根源于她们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担关怀责任把妇女纳入并非自己的声音之中,导致她们以他人的观点作出判断。因此,以判断的分散和混乱显现出来的妇女的道德劣势无法与妇女的道德力量,即对关系和责任胜于一切的关注分开。不情愿作出判断或许本身就是对他人关怀和关切的表示,在妇女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这便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妇女心理发展方面成问题的东西。

因此,妇女不仅在人际关系背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男人生命周期的位置一直是养育者、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织者。但是,当妇女由此而承担起对男人关怀的使命时,男人们却在自己的心理发展理论中(就像他们在经济上的安排一样)倾向于怠慢和贬低这种关怀。当对个性化和个人成就的专注进入到成年阶段和成熟期,与人的自主性等同起来时,注重关系就成了妇女的弱点而不是人类的力量(Miller, 1976)。

在布劳维曼、沃格尔、布劳维曼、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1972)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报告中,妇女与成年之间的差别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些研究不断得出的发现是,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象为妇女自身的特点。这些模式也表明当女性在男性领地中处于工具能力的状况下,归为妇女的表达能力——爱与工作之间的分裂。然而,倘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些模式反映了本身就失去平衡的成年概念——对个性化的自我分离的赞美胜于对与他人联系的赞美,更倾向于自主的工作生活而不是爱与关怀的相互依赖。

目前男人们庆贺的对中年生活中亲密关系、关系以及关怀重要性的发现是妇女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的东西。然而,由于人们一直把妇女的知识看成“直觉的”或“本能的”,把解剖学功能与她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心理学家也总是忽视描述这种知识的发展。我在研究中发现,妇女的道德发展集中于对这种知识的说明,并且由此描绘出两性生活中心理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道德发展的主题不仅为人类发展文献中观察评价性别差异时反复出现的模式提供了最终解释,而且更突出地说明了为什么妇女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如此之久地含糊不清,并被罩上神秘的面纱。

弗洛伊德对妇女公正感(把它看作在拒绝盲目公正方面作出让步)的批评,不仅再现于皮亚杰的著作中,而且再现于柯尔伯格的著作中。当皮亚杰对儿童的道德判断进行说明时(1932)女孩是局外人出于好奇他把完全省去“男孩”指标中的四个重要条目应用到女孩因为“孩子”被假定为男性的正是从

这种研究中，柯尔伯格得出了妇女简直就是不存在的理论。柯尔伯格（1958, 1981）描述的从儿童期到成年期道德判断发展的六阶段理论基于对 84 个男孩的经验研究，柯尔伯格对他们的发展追溯研究了二十余年。尽管柯尔伯格自称自己的发展次序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但他所研究的这群人中并没有包括无法达到他更高阶段的最初的样本（Edwards, 1975; Holstein, 1976; Simpson, 1974）。因此，当以柯尔伯格的标尺进行衡量时，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人们当中首先就是妇女，她们的判断似乎停留在柯尔伯格六阶段序列的第三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人们根据人际关系的概念来看待道德，善被等同于帮助他人和令他人愉快。柯尔伯格和克雷默（1969）认为这个善的概念在成年妇女的家庭生活中发挥作用。柯尔伯格和克雷默暗示说，只有在妇女进入到传统上男性活动的领域时，她们才会意识到这种道德视角和进步是不够的，要像男性一样通向更高阶段——关系服从于准则（第四阶段），准则服从于普遍的公正原则（第五、第六阶段）。

但是 这里有一个矛盾：传统上一直定义为女性的“美德”，她们的关怀以及敏感于他人需要的特性也是表明她们在道德发展上不足的特性。然而，按照这种道德发展观，成熟的概念是从对男性生活研究中推论出来的，反映出个体化在男性发展中的意义。皮亚杰（1970）在对一种人们普遍持有的，从婴儿期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式发展理论提出挑战时指出，相反的是，发展的概念是从成熟的制高点，即进步被追溯的最高点上悬挂下来的。因此，成熟概念的改变并不仅仅改变了对最高阶段的描述，而且重铸了对发展的理解，改变了全部的说明。

当人们开始研究妇女并从她们的生活中得出其发展结

时，不同于弗洛伊德、皮亚杰或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概念才初露端倪，并且宣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描述的出现。按照这个概念，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竞争着的权利，解决道德问题需要情境的、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这一关系到关怀行为的道德概念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确立起道德发展的核心，正像公平的道德概念把道德发展同权利和准则联系起来一样。

禁锢于柯尔伯格的体系中，妇女对道德问题的这种不同建构可能被看成她们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据。在把所有责任建构都视为体现了对道德习俗水平理解的过程中，柯尔伯格把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定义为出自对人们权利的反省性理解。权利道德与责任道德的差别在于它强调的是分离而不是联系，它运思的焦点是个人而不是关系，这可以从关于道德本质问题访谈的两种回答中得到说明。第一种回答是参加柯尔伯格研究的一位 25 岁的男性作出的：

（道德一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它是对个人权利，其他人权利以及不干涉他人权利的认识。对待他人要像对待你自己那样公平。我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是保证人的生存权利，这是最为关键的。其次是人们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权利，这当然是在不干涉他人权利的情况下。”

（自上次访谈以来，你对道德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我想自己现在更多地意识到了个人权利。以往我按照自己的看法，为了自己而严肃地看待它。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一个人有权去做什么。”

柯尔伯格（1973）引用这位男性的回答作为对原则性的、体